

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发展及成因

郭维维¹, 田文波²

(1. 中北大学 体育学院, 太原 030051; 2. 山西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太原 030012)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 对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发展及成因进行研究。指出, 该地区地处特殊的文化地理位置, 形成了明显有别于农耕与游牧的半农半牧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伴随着两种文明的不断碰撞与交融, 武术这一身体文化也在该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 并对摔跤、射箭和武术文化进行具体分析。对成因的探究显示, 黄河是凝聚农耕思想的武术身体文化在晋陕蒙边界地区传播发展的根基与命脉, 长期的民族冲突为武术技击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移民则是武术文化在该地区传播的载体。

关键词: 晋陕蒙边界地区; 武术; 摔跤; 射箭; 黄河; 民族冲突; 移民

中图分类号: G8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596 (2017) 03-0090-07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武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作为中华先民身体文化的结晶, 武术在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文化圈中都有着重要影响。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所以地理学也成为武术文化研究的重要视角。现阶段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核心文化圈和固定行政区划, 而边缘地区的武术文化研究还不是热点。晋陕蒙边界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连接地带, 地处标志着农牧分界线的 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南北两侧、黄河几字向下拐弯后的东西两岸。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形成了该地区长期有别于南北的半农半牧的社会文化形态, 成为天然的民族熔炉。鉴于该地区经济社会形态及文化形态的整体性, 对生长于其间的武术文化进行研究, 对于从微观和中观角度分析武术文化, 解读武术的文化基因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本研究展开的基本逻辑起点和研究的基本诉求。

2 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的历史交融和表现形式

晋陕蒙边界地区北阻游牧, 南通中原, 自古以来极具军事战略价值。因此两千多年前这一区域就已开始修筑长城防御体系。秦汉时期及以前, 中原政权将领土扩张至阴山脚下, 而汉之后三百多年中原战乱, 使西北方各民族有了可乘之机, 雄据山西各地及陕西北部区域, 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而当这些民族进入农耕文化领地之后, 在文化的交融中被中原农耕文化不断同化, 然后再与中原农耕民族一起与更北方的游牧民族抗衡, 这种南北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规律让这一地区成为了中华大地上天然的民族熔炉, 这样两种文明之间的长期战争痕迹遗存又形成了独特的长城文化。同样的, 在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这一身体文化上, 也留下了两种文明交流与融合的痕迹。

2.1 摔跤的分途

长期生活在草原上淳朴的游牧民族, 由于其

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即使在长期的文明冲突中,也依然以弓箭和弯刀作为战争工具。而相对于兵器的简单,力量才是他们一直重视的训练内容,所以摔跤一直是他们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与休闲娱乐的必要内容。

摔跤也曾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中原武事训练中。周代的讲武活动已将射御、角力作为军事训练内容。不论是相搏、角力、斗力、角抵、手搏、相扑、白打等,都是古代战争的一种基本训练方法,单凭力气与技巧,赤手空拳将对手打倒。尤其在古代民间长期流传的角抵戏,从形式上看,与蒙古族热爱的搏克、满族的布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摔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从战争角度看,中原的徒手军事训练手段从踢打摔拿并行的相搏,到秦时罢为“角抵”,再到角抵与手搏并行发展,最后是拳术套路及打擂台取而代之。同时,频繁战争大大促进了冷兵器的发展,兵器训练逐步占据主要地位,即所谓“十八般兵器”(“十八”仅表示数量多),徒手相搏技术的训练随之被列为武艺之外或十八般武艺之末。宋代戏文《张协状元》中一句:“十八般武艺都不会,只会白厮打。”^{[1]143}就反映的这种状况。从功能的角度来说,徒手相搏逐渐被拳术套路取代,拳被认为是十八般武艺的基础,拳术中既有练技的套路,又有练力的功法;从娱乐的角度来讲,拳术擂台赛的形式比角抵戏单一的摔法更具观赏性;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原一直以来受易经思想的影响,着重其变化,从后来的内家拳术中可以看到,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成为练武之最高境界,而且受历代重文思想的影响,更让武术从直观“力量之武”较力向“点到即止”较艺的精神层面转变。诸多因素使中原大地本受民间热捧及军旅训练必备的摔跤运动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欢迎的各色拳种;而游牧民族则因生活方式的影响将其延续至今。

换言之,摔跤这一军事训练内容原本在远古时期两种社会形态中都备受重视并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却在两种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分道扬镳。草原环境地域辽阔,牧民逐水草而居,简单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更注重速度与力量,弯刀既作为生活用具,也用于战争砍杀,从实用性的角度也能看出其军事手段重力量而非技巧,摔跤

虽是一项“宣勇气、量巧智”^{[1]26}的运动,但更主要突出力量训练。中原地势各有不同,其军事手段以力量为基础但更注重技艺,从兵器的发展中也可看出,刀、钺、剑等兵器各有技艺侧重;加之农耕文化的发展,使中原人民更注重“中”,讲究攻防平衡、技力并重,故中原农耕文化中原以练力为主的“角力”最终被讲究练功与练技并举的拳术套路取代。

2.2 冷兵器时期习射为首

马背上的草原游牧民族一直延续着狩猎的生活方式,并作为畜牧经济有益的补充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地位。游牧民族狩猎经验非常丰富,狩猎是众多狩猎方式中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因此,射箭技艺作为游牧民族的生活及应战能力一直备受重视,在儿童时期就开始培养骑射和摔跤。《夷俗记·教战》中载:“今观胡儿五六岁时,即教之乘马……稍长,即教之蟠鞍超乘,弯弓鸣镝……少而弓马,长而精焉。”^[2]《黑鞑事略》亦载:“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3]这种习射尚武之风甚至体现于游牧民族的婚俗中,当新郎接亲出发时要面向婚车前后方射箭,即“射灾”婚俗,足见草原游牧文化中射箭的重要性。

草原民族所擅长的射箭技术,也是中原历朝历代军武所最重视的内容。从生活形态的角度讲,原始时期弓箭“亦工具亦武器”,而中原进入农耕时代以后,弓箭则主要以战争远兵器的形式存在。而为了普及,射箭甚至在古代被上升为礼、艺的层次。《射义》载:“射者,男子之事也”^[4],指出射箭的重要性,男子无不习射。郑锷:“射之为艺,用于朝觐宾燕之时,其事为文,用于田猎攻守之时,其事为武。”^[5]足见自周朝始,射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游牧民族的骑兵出奇制胜的战术在中原地区广泛普及,以至于汉朝霍去病能带领精锐骑兵逐匈奴于大漠。其后因战争而实行的府兵制、武举制中,骑射、步射等射箭项目均在各科之首列,亦反映出射箭在古代战争和军事训练中的绝对性地位。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火器的大量使用,射箭被射程更远的火枪、杀伤力更大的火炮取代。而在

游牧文明社会形态下,其作为一种狩猎工具还暂时占据过历史舞台。火器可以射杀猎物,但没有射箭悄无声息的自然性,但在消声器、麻醉弹等武器被创造使用之后,射箭作为狩猎工具也最终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现在只能以一种娱乐活动和比赛形式被大众欣赏。

2.3 武术文化繁荣

明清是武术的大发展时期,各色拳种、门派、民间武术家大量涌现,成就了武术文化的鼎盛。这一时期,晋陕蒙边界地区带也同样出现了武术文化的繁荣景象。

晋陕北部的山地一线交通不便,古代只能靠马车、驴车作为运输工具交通南北,路途险远,常遇强盗,当地百姓为了自卫而习武,但因刀枪剑等武器携带不便,便利用赶车必用的鞭杆作为兵器^[6],并经过长期演变及武术家们的加工整理,最终形成了具备半农半牧文化特点的独树一帜的鞭杆武术文化形态。鞭杆及鞭杆拳是在清代晋陕蒙边界地区发展起来的本土拳种,并因其携带方便,时下受到健身群众的普遍喜爱。

随着世界航海技术的迅速崛起,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人开始了到世界各地开辟殖民地的高潮,以及18世纪末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商业繁荣,使得沿海地区成为了全球商业必争之地,中华大地的对外文化冲突与交流中心区域也随之转移。相对于之前的纷争不断,大清帝国的长城一带却和平稳定,加之天然的灌溉条件,吸引了上百万人口的流入,晋陕蒙边界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与经济文化大发展,其中自然也包括武术这一身体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由于地域便利,晋商在明代就已在晋陕蒙边界地区及更北的蒙古草原进行长期的贸易,积累了与草原民族交流及贸易的宝贵经验。在满清统一中国后,这种优势突显,最终确立了晋商在内蒙古地区的商业地位。随之,在“走西口”这条文化交融道路上出现了大批“晋商守护者”——众多形意拳镖师作为晋商繁荣发展的有力保证,为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图1)。这也是“形意拳在内蒙古地区流传很广”^{[7]6}的重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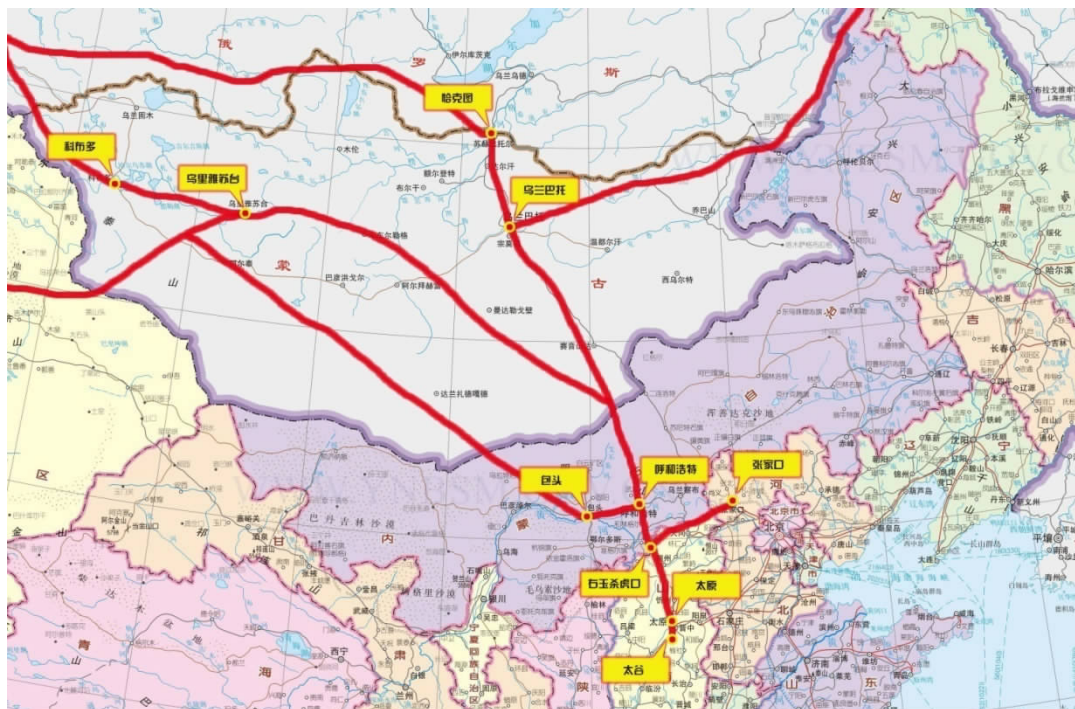


图1 形意拳镖师走西口路线图

同样,各色拳种随着武术传承者或文化传播主体的大量流动而进入这一地区。在游牧与农耕的边缘过渡地带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

武术这一特殊的身体文化也相互交融,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武术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繁荣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 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成因分析

3.1 黄河:武术文化的根基与命脉

考古史料发现,晋陕蒙边界地区的原始农业痕迹随着仰韶温暖期的结束而消失,除了刀耕火种对土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自然天气的决定因素,寒冷期来临之后,该区域气候干旱,生存环境恶劣,晋陕之北的地区都少有人居住^[8]。直到公元前300年后,人们不断掌握了灌溉、施肥等农业手段,在400毫米等降水量之北的土地上,黄河给予的灌溉先天优势,使农耕活动得以北移,并一直延伸至阴山脚下,农耕与游牧在这个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开始了文化交融。黄河除了为这个地区提供了自然基础外,更形成了这个地区的文化根基。正是因为有黄河,才出现了这样一条文化过渡及缓冲地带,这样一条长城文化带,这样一片半农半牧的文化区域,才使中原农业人群翻越群山、历经千难万险到这里耕种、谋生,形成了区别于南北的半农半牧社会形态。传播者对文化的传播是整体性的,而非选择性的,这样作为身体文化的农耕武术文化才有了在这个地域传播与发展的可能,与游牧民族所盛行的搏克运动等共同构建出力量与柔美、粗犷与细腻的独特的武术文化形态。

3.2 冲突:冷兵器时代武术技击发展的动力

原始时期,人少而兽众,人们防御野兽以获得安全,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开始主动征服野兽以获取食物,进而发展到人类之间为争夺生存资料的主观战争,这就是武术的萌芽时期。因为在那个时代,武是解决纷争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在整个冷兵器时代,武术的发展与战争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是战争发展的附属品。在当时以马为交通工具、以刀箭为战争工具的条件局限下,单兵作战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冷兵器战争给武术技击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众所周知,华夏大地上自古以来战争不断,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持续了千年之久的晋陕之北、阴山之南的纷争。该地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各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要素都相对单一:中原以农业为主,土地即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广袤的欧亚草原以游牧为主,草地即为最

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同自然条件、生存环境下,争夺生产资料就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发展的长期规律。草原游牧民族“聚而成军,散而为民”的组织形式及马背上民族的整体行进速度,都是令中原历代农耕政权担忧的,这导致多数中原农耕政权都热衷于在边界区域修筑长城,同时又不得不重视武备,更让生活在这一区域的“边民”们时刻保持着“尚武”“习武”的生活习俗。在冷兵器时代逝去几百年后的今天,摔跤这一曾被冷兵器战争所重视的非常训练手段,依然作为一种民俗活动而在这一区域广泛流传,漠南民间广泛开展的“博克”、山西忻州地区长期流传的“挠羊”等都是如此。

在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和频繁的战争中造就出无数著名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被人世代传唱,并从中抽取出诸如“正义”“忠勇”“担当”“自强不息”等武德要求,从而给武术的技击活动注入了灵魂,鲜活地展示了生命之意义、练武之价值,更为习武之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在武德的纽带作用下,武者与英雄之间逐步画上了等号,抽象的英雄标准也被拿过来衡量武者,如有武者以强凌弱、路见不平而未拔刀相助、国家危难之际没有挺身而出等,均会被其他武者不齿,更会被大众所唾骂。习武已经成为身体上强健筋骨、精神上修身律己,奔向“英雄”和“正义”,迈向成功的理想之路。

可见,民族的长期冲突,给中原及草原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却极大地推动了武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足发展,这是冷兵器时代该地域及整个华夏大地武术得以传承的重要动力。

3.3 移民:武术文化传播的载体

明代郑和下西洋叩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大门,因贸易需求引发的争端大都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以至于殖民引发的全球化战争爆发后,所争夺的焦点都远离内陆而集中在沿海口岸城市。加之明朝后期马市、互市制度的建立,使得晋陕蒙边界这片“亦耕亦牧”的肥沃土壤冲突骤减,没有了刀光剑影,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的交融与商贸的繁荣。与此同时,“走西口”的人口迁移带动了包括武术在内的文化传播。

表 1 清水河、和林格尔、托克托三县人口增长情况表

地区	1765 年左右	1851 年	1871 年	1882 年	1907 年	1953 年
清水河	16 500	24 000		14 608	38 862	60 845
和林格尔		31 800	38 400		57 200	102 072
托克托				90 184	95 278	

表 2 清代清水河等县立村数量情况表

时间	清水河	和林格尔	托克托	丰镇	凉城
清初	—	26	9	—	—
顺治	5	4	1	1	1
康熙	19	16	10	5	18
雍正	2	4	1	14	4
乾隆	12	34	92	58	60
嘉庆	1	3	9	7	3
道光	2	2	10	19	9
咸丰	1	—	69	4	—
同治	—	2	5	2	3
光绪	2	3	22	9	25
清末	—	5	3	1	1
总计	44	99	231	120	124

注：表 1、表 2 数据来源于王卫东《融会与建构》。

从表 1、表 2 数据中也可看到移民规模的宏大，这样大规模移民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对晋陕蒙边界地区有着深远影响的“移民文化”。武术作为一种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文化也大规模“登陆”这个区域。

晋陕北部的黄土高原因长期开垦，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明代已有不少人被迫外出谋生，而明末清初的灾荒、瘟疫及战争更使该地区人民背井离乡，谋求生存。清初受政策限制，晋陕北部之民只能春去秋回，不能在其北部广袤肥美之地入籍，因此被称之为“雁行人”^{[9]16}。康熙就此事称：“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种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之后政策逐步开放，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张鹏翮出使俄罗斯经过口外时，看到不少村落已是一派农区风光^{[9]3}。同治《河曲县志》载：“蒙古准噶尔旗地，自康熙三十六年奉上海谕，河曲人稠地狭，借来蒙古地广长六十里，按保甲法设立通事牌、甲头，使民耕信，归河曲县管辖”。雍正十年规定：“蒙古情愿招民人越界耕种，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乾隆时，出口垦荒人更多，晋陕之民大

量走出口外，掀起一股移民口外的热潮，而靠近晋陕之北长城一带的最为集中，至清末移民及其后裔已达一百多万左右。居住方式从“蒙与蒙居，汉与汉居”到杂居，语言从蒙汉双语到汉语取代蒙语，现在我们在呼和浩特及包头，听到所用的语言基本和晋北方言相差无几，这与陕北晋语及“走西口”绝大部分都是晋陕之民有绝对关系。充分说明，伴随着“走西口”人口迁徙热潮的是文化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等的迁移。

在这一时期，作为一种身体文化的武术也随着“走西口”大潮而进行传播。随着晋商在口外的昌盛，山西武术拳种也大量“移民”口外，朝着“走西口”的方沿杀虎口、清水河、托克托、呼和浩特、萨拉齐、包头等一线广为传播。“公元 1867 年，在恰克图（现在蒙古国与俄罗斯边界）的晋商茶商由原来的 120 家减少到 4 家”^{[10]57}，可以看出当时这一晋商之路的繁荣及衰落，亦可想当时有多少护镖镖师从这条商路走过，从戴文雄给曹家护镖，李老农给曹家、孟家护镖，车永宏护镖足迹也远至俄国伊尔茨克和莫斯科^{[10]67}，以及李太和在榆次隆泰镖局护镖于山西、北京、内蒙一带多年^{[10]22}等等不胜枚举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走西口不仅是农耕向北扩展之路，不仅是晋商在内蒙古地区的繁荣之路，也是一条镖局的繁荣之路和武术文化的传播之路。《山西武术拳械录》^{[11]179}和《内蒙古拳械录》中同时明确：任氏螳螂拳在清代由晋北一带传入内蒙。《内蒙古拳械录》中记载：“形意拳在内蒙地区流行很广，追溯其根源主要是从山西、河北传来。时间大约是清末。”^{[7]6}《绥远通志稿》卷九十六人物（方技）载：“吴英，托克托厅，农家子，清同治初从山东德州人孙老学大竿枪并太祖拳。十二年，得董海川八卦走法，技益精。”^[12]这与《内蒙古拳械录》八卦掌描述中：“托县已故老武术家吴英曾直接拜师董海川

学得此拳,并在当地传授多人”^{[7]7}的说法一致。通志稿中对吴英描述为“同治农家子”,对其子吴桐的介绍是回族,祖籍河北沧州,说明吴英祖上也是“走西口”至此的。《内蒙古拳械录》对炮捶这样描述:“内蒙地区流行的炮捶是从山西、北京传来的,属于‘于派’。民国初年,会支镖局于锦堂,受山西军阀阎锡山聘请,到太原督军府任武术总教官,丰镇武术家赵文虎,和于锦堂学得此拳,并传于内蒙。”^{[7]8}同时,八法拳也是由赵文虎从山西八法拳创始人李德茂处习得而传入内蒙的^{[11]216}。《内蒙古拳械录》中对查拳的描述:“明清以来,迁居内蒙的山东、河北人将此拳传入内蒙。”^{[7]16}在山西与内蒙都广泛流传的弹腿也应该是此时期从山西流入内蒙的,从山西与内蒙拳械录对比中可以发现:山西弹腿在清代已负盛名,流传“王家的枪,戴家的手,左二把的弹腿天下走。”左昌德(左二把)一生以保镖为业,还曾因护镖有功受道光皇帝赐黄马褂一件及镖旗一面。而内蒙古弹腿没有对其源流的明确记载,但其风格特点与左二把弹腿的“一路一法、功架完整、左右对称”及发腿不过膝等完全一致。十路弹腿与十二路弹腿也与左家极其相似,不排除弹腿随着清代晋商与镖行崛起而传入内蒙的可能。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拳种随着移民而传入内蒙,但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明清及之后的几百年里,大量涌入内蒙古漠南地区的移民不仅对这个地域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更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搬家”逐步发展为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文化交融”。武术作为一种与人紧密结合的身体文化,在移民洪流中逐渐积淀下来,并形成了该区域独特的武术文化形态,成为该区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4 结语

晋陕蒙边界地处特殊的文化地理带,从其地貌来看,处于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连接地带;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它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沿线,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重要界线;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它处于北至阴山南至龙门的半农半牧经济带,是战略要地,曾留下了长城这样宏大的军事工程;从民族融合角度,这里是天然的

民族融合熔炉,是两种文化的渐变过渡地带。相对于直观的地理过渡,文化的交融性和渐变性更为明显,文化不可能像地理地域区划一样截然分野。晋陕蒙边界地区与山西、陕西核心文化地带相距甚远,而其文化形态也明显有别于各省核心文化形态,而是呈现出边界地区的文化趋同及有别于其他地域的整体文化形态。

晋陕蒙边界地区的武术文化形态同样独具特色。晋陕之北山地造就了独特的鞭杆武术文化,冷兵器时期长期的战争促进了这一地区人们“尚武”骠悍的性格,伴随“走西口”的文化迁徙,各色武术拳种在这一地区传播发展。在这一特殊的武术文化形态形成过程中,黄河的滋养使农耕文化在“农牧分界线”以北的地区扩张成为可能,成为农耕思想集中体现的武术身体文化在这一地区传播与发展的根基;边界长期的战争需要推动了武术作为冷兵器时代军事训练手段的长足发展^[13],是武术技击发展的动力所在;移民是文化传播最快的形式^[14],与人密切相关的武术身体文化更依附于明清以来的人口大迁移而在该地区获得繁荣。

参考文献:

- [1] 蔡宝忠.中国武术史专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
- [2] 崔春华.夷俗记校注[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34.
- [3] 彭大雅.黑鞑事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10.
- [4] 孙希旦.礼记集解[M].上海:中华书局,1989:1438.
- [5]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M].上海:中华书局,1934:331.
- [6] 陈盛甫.山西鞭杆调查报告[J].山西体育文史,1985(5):50.
- [7] 内蒙古体委群体处.内蒙古拳械录[M].呼和浩特:内蒙古体育运动委员会,1985.
- [8]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90.
- [9] 王卫东.融会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0] 吴秀峰,孙石轩.形意拳发展史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 [11] 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武术挖掘整理组.山西武术拳械录[M].太原: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

会,1985.

[12] 绥远通志稿编纂组. 绥远通志稿[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697.

[13] 田文波. 战争与民族融合:民族传统体育早期发展的动力源泉[J]. 搏击·武术科学,2015(5):1.

[14] 唐晓峰. 文化地理学释义——大学讲课录[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56.

The Development and Causes of Wushu Culture in Border Areas around Shanxi, Shaanxi and Inner Mongolia

GUO Wei-wei¹, TIAN Wen-bo²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2. Shanxi Sports Culture Media Co., Ltd., Taiyuan 03001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and causes of Wushu culture in border areas around Shanxi, Shaanxi and Inner Mongolia by using literature and logic analysi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is region is located in a speci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forming a social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system of semi-agriculture and semi- animal husbandry which is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farming and nomadism. With the continuous collision and blending of the two civilizations, the body culture of Wushu also forms a unique cultural form. And th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wrestling, archery and Wushu culture. The study of the causes shows that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foundation and lifeline of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Wushu body culture in the border areas around Shanxi, Shaanxi and Inner Mongolia, and the long-term ethnic conflict provides the impetu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Wushu. Immigrants are the carrier of the regional spread of Wushu culture.

Key words: border areas around Shanxi, Shaanxi and Inner Mongolia; Wushu; wrestling; archery; Yellow River; ethnic conflict; immigrants